

珞珈风云

——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

主编 涂卜



珞珈风云

——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

主 编 涂上飙

副主编 郑公超 秦 然

执行主编 吴 骁 刘文祥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珞珈风云: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涂上飙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1

ISBN 978-7-307-19089-4

I. 珞… II. 涂… III. 武汉大学—校史 IV. G649.28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4902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7.25 字数: 406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089-4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宏图初绘

骑驴疑云

- 李四光与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历史真相 吴 骁 (3)
-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界址的历史变迁 吴 骁 刘文祥 (25)
-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筑师开尔斯
- 二三事 刘文祥 吴 骁 (35)
-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总体规划的演变 刘文祥 (41)
- 珞珈山新校舍建设中的迁坟风波 涂上飙 (52)
- 珞珈山校园地契背后的故事 刘文祥 (57)

黄舍渐成

汉协盛营造厂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

- 新校舍 吴 骁 刘文祥 (71)
- 气势恢宏的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 吴 骁 (78)
- 中西南北之间
- 关于“文采飞扬”与“法理正直”的一场
- 历史误会 刘文祥 (90)
- 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
- 以民国大总统命名的校园建筑 吴 骁 刘文祥 (98)
- 珞珈石屋、听松庐与半山庐 刘文祥 吴 骁 (107)
- 鲜为人知的“庚子烈士纪念馆” 刘文祥 (123)

斯人已逝，簧宫长在

——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武汉大学人文

科学馆	刘文祥	吴 骁	(128)
武大“十区”考	涂上飙	向晓露	(134)

抗战烽火

20 世纪 30 年代武汉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涂上飙	(151)
20 世纪 30 年代武汉大学教师的抗日救亡运动	涂上飙	(166)
国联调查团参观武汉大学始末	吴 骁	(189)
一二·九运动中的王星拱校长	吴 骁	(197)
抗战爆发初期的王星拱校长	吴 骁	(206)
武汉抗战与国立武汉大学	刘文祥	(224)
珞珈山上的国共合作与团结抗战	涂上飙	向晓露 (239)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几次演讲的正确时间	吴 骁	(253)

风云际会

武汉大学与东湖	刘文祥	(265)
蒋介石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刘文祥	吴 骁 (275)
1932 年胡适的武大之行	吴 骁	(284)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樱花的历史来源	吴 骁	(293)
武汉大学六一纪念亭	吴 骁	(306)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殉难学生墓葬变迁史略	胡 耀	(312)
武汉大学经济学科早期发展历史追踪	林子杰	(324)
1958 年毛泽东主席视察武汉大学始末	秦 然	(336)

珞珈遗珍

档案馆可移动文物档案鉴定概述	郑公超	刘春弟	(343)
档案馆国家一级可移动文物概述	郑公超	刘春弟	钟 崑 (349)

档案馆国家二级可移动文物概述·····	刘春弟	郑公超	钟 巍	(362)
档案馆国家三级可移动文物概述·····	刘春弟	郑公超	钟 巍	(384)
国立武汉大学校徽、校训、校歌的产生经过 及其文化解读·····	吴 骁	刘文祥	黄一秦	(403)
武汉大学名人档案选介·····			王 环	(419)
武汉大学校史馆简介·····			吴 骁	(426)

宏图初绘

骑驴疑云

——李四光与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历史真相

吴 骁

在武汉大学校园内，有一座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塑像，其造型为背倚一头毛驴，一只手搭在眉间，双眼凝视远方。这一奇特造型源自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一个美好动人的传说——李四光先生当年骑着毛驴来到武昌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下，为这里的美丽风景所深深吸引，于是便将此处选定为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址。近 20 多年来，这个故事在武大师生中可谓家喻户晓，流传甚广。



图 1 武汉大学校园内的李四光塑像

根据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各种资料，李四光为武汉大学“骑驴选校址”的故事，最早出自 1993 年出版的《漫话武大》一

书中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现将该文对此事的具体记述全文照引如下：

新校舍建在武昌郊外的什么地方呢？李四光开始心中并没有数，正在他着急时，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著名农学家叶雅各说：“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李四光听后如获至宝，他非常急切地要和叶雅各一块去察看。

当年的珞珈山一带属武昌郊区，荒山野岭，一片凄凉。从城里到珞珈山，不仅不通车，而且连像样的路都没有。这当然难不倒李四光，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平时外出考察，所到之处大都是人烟罕至的地方。不通车，他便和叶雅各自带干粮骑着毛驴出城。来到珞珈山下，看到这一带的东湖美景，李四光这位曾经到过无数山山水水的地质学家也被陶醉了。他激动得从毛驴上跳了下来，紧紧地握住叶雅各的手，一遍一遍地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校址了，没有比这更漂亮的地方了，您真是慧眼识珠啊！”回去后不久，李四光又请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来察看，大家无不称好。1928年11月，李四光主持了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武昌东湖珞珈山一带为武汉大学新校址。武汉大学新校址就这样确定了。^①

现在，问题来了——今日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校址真的像上文所说的那样，是由李四光和叶雅各两个人一起骑着毛驴发现并选定的吗？如果以上记载准确无误，完全与史实相符，那么，此事又是如何为他人所获知并且流传开来的呢？按照上文所述，在骑毛驴选校址的过程中，只有李四光和叶雅各两位当事人，因此，如果此事属实，则必定是他们二人中至少有一人曾亲口为他人讲述此事，再由听者继续传播开来，或是自己以撰写文章、日记、回忆录等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

^① 《李四光与武大》，刘双平编著：《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此外便再无其他可能。因此，我们似乎可从以上两个基本途径入手，仔细考证一番此传说之真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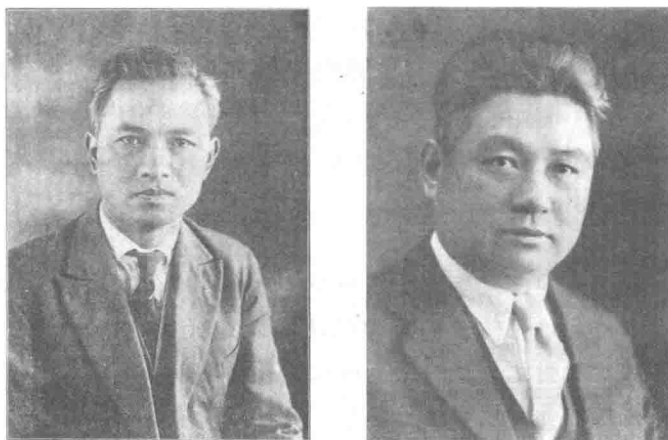


图2 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左）、委员兼秘书叶雅各（右）

一、关于李四光与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若干早期研究与记述

1977年9月，也就是在李四光先生去世6年之后，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五人“接受了编写《李四光传》的任务”。他们“先后在李四光同志身边工作过若干年，对李四光同志的生活情操、思想意境、学术造诣、治学精神、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等等，比较熟悉”。然而，在4年多的编写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说，“李四光同志生前没有写过日记，也极少写回忆性的文章，平日谈话也很少谈到自己过去的事。这就增加了我们对证某些传述性资料可靠程度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除了查阅大量的有关档案资料和书报杂志外，还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发出了一批信件……我们还访问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和女婿邹承鲁同志，他们给我们作过系统的介绍，提供给我们一些珍贵的照片。还有李四

光同志生前的许多学生，如许杰、杨钟健、俞建章、赵金科、孙殿卿、叶连俊、吴磊伯等同志，他们也都根据自己亲身的感受，介绍了大量生动的事迹。这些都是传记不可或少的基础材料”^①。1982年3月，陈群等人完成了《李四光传》的编写工作。1984年6月，该书正式出版。书中有关武汉大学的内容极为简略（且有少量史实错误），仅在该书第三章《在艰辛的科学道路上》中的“从西藏高原讲起”一节中提及，其中关于李四光与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建设新校舍的全部内容如下：

武汉大学，是李四光参加筹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28年7月，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大学院决定改建武昌中山大学为武汉大学，聘请刘树杞、李四光等八人为筹备委员。^②8月，任命刘树杞为主任委员，代理校长职务；同时任命李四光、王世杰、张难先、石瑛等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李四光为委员长。11月，建筑设备委员会决议，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的珞珈山一带为新校舍地址。1929年2月，王世杰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0月，新校舍落成，蔡元培、李四光等参加了典礼。^③王世杰在会上说：1920年从欧洲回国的路上，曾与李四光说到，要在有山有水的

① 以上内容参见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记”，第397~398页。

② 事实上，1928年6月由蔡元培决定的包括李四光在内的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人选共有9人。参见《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第九次常会议事日程》（1928年6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月报》第1卷第1期（1928年7月），“会议录”，第57~58页。

③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于1931年底完工，并于1932年5月26日举行落成典礼。参见《本校布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8期（1932年5月24日）；《本校新校舍落成典礼王校长报告词》，《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9期（1932年5月31日）。在2009年出版的《李四光传》第三版中，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的时间被改为“1932年10月”，年代虽已改正，但月份依然有误。参见陈群、段万倜、张祥光、周国钧、黄孝葵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第355页。

地方，办一个现代化的大学，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①

也就是说，《李四光传》的几位作者，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并访问了李四光先生的后人及学生之后，并未在最终的传记中写下李四光和叶雅各一起骑毛驴选址珞珈山这个故事，关于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选址过程这一问题，仅仅是一笔带过。

1983年11月，在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期间，《长江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李四光与武汉大学》的文章，该文的前两段文字如下：

今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是武汉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在这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华诞之日，许多老人都会想起李四光教授。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如何会与武大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呢？

原来今天位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原址是在武昌东厂口，校园太小，需要另择地扩建。一九二八年七月，李四光担任了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经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推荐，他又被任命为武大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那时，为选择好新校址，李四光经常亲赴珞珈山勘察地形和地质，还请人从上海包了一架专机到东湖一带低空盘旋察看。十一月，委员会终于选定了郭郑湖（现名东湖）之滨的狮子山、落驾山（即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②

该文对李四光为武大选址过程的记述比《李四光传》要略多一点，而多出来的这点儿内容，甚至还专门提到了李四光请人包飞机在东湖上空盘旋察看这种颇有意思的历史细节。不过，即使是碰上学校的“华诞之日”，“许多老人都会想起李四光教授”，但似乎没有人像“想起”包飞机考察校址一事那样“想起”李四光和叶雅各一起

① 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侗、黄孝葵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② 驾山：《李四光与武汉大学》，《长江日报》1983年11月13日。

骑毛驴选址珞珈山的故事。

1984年11月出版的《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一）》一书，收录了武汉大学教师李进才、娄延常所写的《李四光与武汉大学》一文，该文在文末特别注明“根据孙祥钟、胡守仁教授及沈中清工程师等人回忆整理而成”。沈中清原为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绘图员，在20世纪30年代曾全面参与过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与身为该委员会委员长的李四光先生在建校工作中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显然比较多。孙祥钟与胡守仁均为武汉大学1933年的毕业生（其中孙祥钟毕业后即留校担任助教），李四光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多次来校，期间他们均有机会与其接触。该文披露了李四光当年在武汉大学与沈中清、孙祥钟等人交流过程中的几处非常微小的细节，甚至具体到李四光向沈中清等技术人员解释松树的英文学名、对帮李四光在学术报告中放幻灯的生物系助教孙祥钟一再叮嘱不要把玻璃做的幻灯片打碎了，等等。但即使如此，孙祥钟、胡守仁、沈中清这几位早年的武大师生，也无人对该文的两位作者“回忆”起李四光和叶雅各骑毛驴选址珞珈山这件看起来如此有趣而又十分重要的事件。该文对选址一事的记述也极为简单——“同年十一月，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选定郭郑湖（现名东湖）之滨的狮子山、落驾山（现名珞珈山）一带为校址。李四光教授为确定新校址亲临珞珈山，选取石料标本，勘察地形和地质”。^①与前述署名“驾山”的同题文章相比，该文的有关记述更为简略，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虽不知“驾山”究竟是何人的化名，但从这两篇文章的全部内容来看，其主要信息来源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1986年，为纪念李四光先生逝世15周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四光研究专家景才瑞与副校长邓宗琦合写了一篇文章——《李四光与武汉大学开办》，文中对于李四光为武汉大学选址珞珈山的过程介绍

^① 以上内容参见李进才、娄延常：《李四光与武汉大学》，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编：《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一）》，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如下：

为了选择好一个有山有水的新校址，李四光经常赴珞珈山与东湖之滨勘察地质与地貌基础，还请人从上海包了一架专机到东湖一带低空盘旋察看。同年11月，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现场观察，最后终于选定郭郑湖（现名东湖）之滨的狮子山、落驾山（现名珞珈山）一带为新校址。^①

非常明显，该文关于武大新校舍选址的相关记述，完全是依据上述两篇《李四光与武汉大学》的有关内容写成的，而且，跟前面两篇文章一样，即使提到了李四光亲赴珞珈山考察以及包专机在东湖上空察看等历史细节，也未提及李四光和叶雅各一起骑毛驴前往珞珈山选校址一事。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教育界已经有少数人士注意到了李四光与武汉大学之间的历史渊源，并且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对诸多相关史料的发掘与利用还远远不够，此类研究普遍不够全面和深入，在史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具体就李四光主持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选址工作这一历史事件而言，所有上述研究和记述，均着墨甚少，而且从未提及他曾与叶雅各一同“骑毛驴”这一细节。也就是说，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在1993年的《漫话武大》一书中的《李四光与武大》一文首次提出李四光当年是和叶雅各一起骑着毛驴来到珞珈山为武汉大学选定新校址这一说法之前，全国学术、教育界还没有任何人曾经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出过同样的说法，该文在此也没有注明出处。因此，不论是从史实来源来看，还是从学术积累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是相当可疑的。

① 《李四光与武汉大学开办》，景才瑞、邓宗琦主编：《李四光学术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39页。

二、1928—1929 年国立武汉大学定址 武昌珞珈山的来龙去脉

对于武汉大学当年选址武昌珞珈山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过程，上文所述的各种记载均过于简略，现在，笔者就以目前所能掌握的各种相对比较详细的系列史料为据，力求更为全面、准确地揭示和还原出这一选址过程的历史全貌，再以此为重要根据来具体剖析李四光与叶雅各骑毛驴选址珞珈山一说的可信程度。

1928 年 6 月，李四光被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据后来担任校长的王世杰于 1929 年 11 月所言，“自从中央决定改武昌中山大学为武汉大学以后，各筹备委员都充满了一个新的好的大学的希望。在某一次开筹备会的时候，李四光先生<把>提出建设一个新校舍的主张”^①。此外，当年同为筹备委员、后来曾出任校长的周鲠生在 1947 年 10 月也回忆道，李四光“在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首先提议以一百五十万元巨款于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改造环境”^②。为此，李四光与周鲠生于 1928 年 7 月一同前往南京面见蔡元培，“言及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并希望他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转达此意，争取其经费赞助。7 月 13 日，李四光为蔡元培代拟了一封致李宗仁的函件，信中如此介绍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的计划：

国立武汉大学，预定为中部之学术中心，而原有校舍及设备，均不足以成一完备之学术机关，故今夏筹备之初，曾由筹备委员会建议，于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并充实图书仪器等设备，预计建筑设备费约需百万元至百五十万元。此项建议呈报大学

① 《本周纪念周校长王世杰先生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 36 期（1929 年 11 月 17 日）。

② 《本校第十九周年校庆暨三十六年度开学典礼校长报告》（1947 年 10 月 31 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 374 期（1947 年 11 月 1 日）。

院，弟极端赞成，当即批准，并指定李四光、麦焕章诸君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开始计划。^①

7月15日，李四光出席了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三次谈话会，此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在洪山下建筑校舍”。^② 7月23日，《申报》刊登了这样一则电讯（见图3）：“武汉大学筹委李四光，提出建设计划大纲，拟以洪山为校址，建筑费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元，已分呈大学院政分会采择。”^③ 由此可见，李四光最初计划为武汉大学“另建新校舍”时，其初步选择的地点乃是“洪山附近”，而不是后来武汉大学校园实际所在的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一带。

◎武漢大學提出建設計劃
 武漢大學籌委會李四光、提出建設計劃
 劃大綱，擬以洪山為校址、建築費一百萬至
 一百五十萬元、已分呈大學院政分會採擇、
 （二十二日下午三鐘）

图3 《申报》1928年7月23日刊载的电讯“武汉大学提出建设计划”

① 以上内容参见《致李宗仁函》（1928年7月1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0~881页。文末注明该文系“李四光代作”，“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② 参见《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纪》，《新闻报》1928年7月21日。

③ 《武汉大学提出建设计划》，《申报》1928年7月23日。